

卓越或公平？

駐波士頓辦事處教育組

20 世紀初，美國大學校院主導著高等教育的發展。這樣的成果，要追溯到 1876 年，約翰霍普金斯遺產託管機構決定將其附屬的大學，與當時頂尖的研究型學府牛津劍橋學院結盟而來。以後，哈佛、耶魯、普林斯頓、加州理工學院等，也紛紛效尤。學術機構研發出許多產物，使世界更安全舒適，改善地球每一個角落的生活。這也是 1995 年美國商界領袖致函國會，請求不要削減大學科研經費的原因。

美國創造了高等教育大眾化，使中產階級的孩子得以上大學。美國研究型大學是金字招牌，許多對手國家加速打造像美國一樣學府，使得高等教育支出不斷上升。根據世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（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-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, OECD）指出，2000 年，高等教育佔國內生產總值 1.3%，2011 年提升至 1.6%。由政府掌控高等教育的歐洲模式不再，美國的私人機構經營方式崛起，使個人要支付更多的學費。

正當美國模式風行世界，美國國內的高等教育卻出現了問題：學習時數減少、大學畢業生表現不如其他國家，費用比 20 前年增加了一倍、入學率下降……。科技的提升，不能降低學費、增加效率。所以，這篇報告即是針對高等教育的研究與教學、卓越與公平，以及技術的運用層面來探討。

早在 19 世紀，高等教育在美國開始從精英普及到大眾。歐洲、日本和韓國陸續跟進，並擴及世界各地。在韓國，幾乎人人上大學。在中國，從 1998-2010 年間，學生人數從 1 百萬增至 7 百萬。世界各國學生人數的增長，超過全球國民生產毛額的速度。全球高等教育入學率，在最近 20 年內，從 14% 增至 32%。在此期間，具有大學文憑佔總人口一半以上的國家，從 5 國躍升至 54 國。

勞力市場的變化、城市化和人口分佈，助長了求學熱潮。高等教育的通道更方便，尤其是阿拉伯國家，提供給青少年更多機會。雖然 18 至 24 歲年輕人的數量，在未來的半個世紀會大幅減少，但可能不會影響高等教育的需求。一旦國家的國民生產毛額高於 3000 美元，高等教育的就開始成長。總體而言，貧困國家回歸高等教育的人數，高於富裕國家。而且全球化的結果，使貧窮國家資歷不錯的人，也有找到好工作的機會。

富裕國家的大學畢業生人數也繼續攀升，文憑與薪資的關係，讓人覺得值得上大學。像是 20 年前高中生就可從事的教師和護士工作，現在也得要大學文憑。勞力市場的變化，也助長強調文憑的重要。自動化作業使得基層勞工的工資下滑，薪資不平等的增長，讓人覺得沒有學位的風險較高。雖有一些軟體業大亨輟學的故事，但是，非大學畢業生要加盟光鮮行列的機會仍然不大。當高標準成為標準，就有更多的人追求研究生學歷。在美國及英國，就業人口中的 14%，具有研究生學歷，研究生的薪資區隔也相對增加。

個人享受高等教育的投資報酬率固然不錯，在社會中，就未必如此。研究生的身價是否代表更高的生產力，也是問題。如果大學教育能提高人民的工作效率，那麼社會就應該花錢投資在大學生身上。但如果它們僅僅是一種機制，讓雇主以為大學畢業生比非畢業生聰明，那就不對了。大學校院是否真正在教育人民？關於這方面的研究很少，社會無法得知投資高等教育是否為明智之舉。

即使社會可以抗辯高等教育投資報酬率是否划算，政治爭論就難免了。民主政府必須提供百姓機會，給予需要的文憑。市場本身不能以合理的利率借錢給沒有信用的學生，依賴私人資金的政府，卻要提供貸款給學生。不是所有高等教育都能提供一流的生產，若投資素質差的高等教育，報酬率就差。因此，正當幾乎所有的政府致力於提供高品質的高等教育之外，現在又面對著另一個全球性的衝突：競相建立頂尖大學。

譯稿人：趙維新

資料來源：民國 104 年 3 月 28 日 經濟學人—「教育專欄」